



## 经典作家之 严文井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之际,纪念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编辑出版家严文井先生诞辰100周年,共同缅怀严文井先生对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这是对严文井先生的文学贡献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

严文井先生191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教师家庭。1935年春到北平图书馆当馆员,从那时起开始用“严文井”这个名字发表作品,并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七·七”事变后,严文井离开北平回到武昌,又辗转到达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投身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1938年5月,他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至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艺小组从事创作,后调任鲁艺文学系任教,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并且在教学之余始终坚持写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南南同胡子伯伯》和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1942年5月,严文井先生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取了毛泽东主席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自觉以讲话精神指导他的工作与创作。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到达东北任《东北日报》副总编,并积极深入东北农村,反映土地改革,写出了报告文学《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繁重的新闻工作之余,他仍始终坚持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创作了著名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

1951年春,严文井先生调入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后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代理秘书长,1952年参与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先后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此,严文井先生在多个文化岗位上,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了大量富有开拓性的工作,直至1983年卸任。

上世纪70年代,我去访问老作家严文井,他介绍完自己漫长的人生和写作生涯之后,诙谐地承认自己“是个60岁的男孩子”。这种坦然的自信,使人看到了一颗率真的童心在跳动,而恰恰是因为这可贵的童心,才使我们有了一位个性鲜明的童话作家,孩子们有了一位可亲而又可敬的艺术家。

1932年,当严文井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如果把这最初的文学活动也包括在内的话,他已经在文学创作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行进了半个世纪。在这50年间,严文井经历了大时代的风风雨雨。从他青年时期对真理的求索,到投奔延安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他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磨难,到迈进历史的新时期;岁月流逝,人世沧桑,惟有一颗童心仍在他胸间跳动不止,不但没有磨损丝毫,反而更加炽热强烈。因为他热爱孩子、对孩子们的成长有一种执著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这可从新版《小溪流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严文井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严文井童话选》(吉林人民出版社)、《严文井童话寓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一大批富有时代特色和清新优美的童话中得到印证。

在一次访问文井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他出生在湖北一个中学教员的家庭,父亲经常失业,家庭生活艰辛。他是老大,要帮助照顾幼小的兄弟们,于是还常常承担给小弟弟编讲故事的任务。那时节,他观察过蚂蚁们忙碌的生活,想象着那小小的昆虫王国的情景;他坐在长江边上注视过各种船只航行,憧憬着“孤帆远影碧空尽”的远方世界;他做过奇幻迷离、色彩斑斓的梦,这梦,直到他老年时,仍温暖着他的心。虽然童年的现实生活充满了悲凉和寂寞,但他却仍向往着美好的未来。10岁时,他就一口气读完了《西游记》,接着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七侠五义》。由于酷爱幻想性的小说,他又找到《封神演义》《镜花缘》《聊斋志异》,正是这些富

# 在严文井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铁凝

不管严文井先生在哪个岗位,做何种工作,都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切实踏实地为文学贡献,为人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严文井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也是丰富的一生,充实的一生。

首先,严文井先生是一位文学大家,其创作成果斐然,广受读者喜爱。严文井先生的创作有着丰富的学识素养作奠基,更有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底。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喜欢大自然,爱幻想,爱读书。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的童年并不快乐,却没有消磨掉他对生活的热爱,为什么,他曾表示过因为有童话相伴,那些世界著名的童话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番美好,他要把这份对美的认识、对光明的向往,带给未来的孩子们。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他愿意倾尽所有心力,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开始创作之初,严文井即敏锐地觉察到儿童写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鲁迅先生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唤醒大众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教教孩子”,要让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具备时代所要求于他们的那些高贵的精神品质、丰富的思想和知识,要他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然而,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抵达孩子们的心灵,为他们所理解、所接受?小时候读过的安徒生童话曾经为严文井童年的心灵带来多少慰藉,儿时的阅读体验使严文井相信童话在架设通往孩童心灵世界的桥梁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正是这种神圣的使命感使严文井先生开始了中国新童话的写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严文井先生以“中国的未来在要求我们加倍工作”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关注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心灵成长,创作了《蚯蚓和蜜蜂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南风的话》《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等在中国新童话寓言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作品,获得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和欢迎。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的严文井青春焕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写作,创作了一批反映新时代风貌的童话和寓言,《南风的话》《歌孩》《浮云》《歪脑袋木头桩》《春夏秋冬》《不泄气的猫姑娘》《沼泽里的故事》等,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新时期培育新一代贡献了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严文井童话寓言集》,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不仅收入了他的代表作,也收录了他多年来关于童话寓言创作、儿童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理论文章。这部合集展示了严文井40多年来在儿童文学方面,特别是童话寓言上的写作成果和心得,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在严文井先生心中,为儿童写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他总是从时代的高度、大局的要求来构思,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大气而高远的气象。他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高尚的品格,作品中那些积极的、儿童式的幻想,不仅符合儿童的特点和情趣,而且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富有深刻的思想含义。对待孩子,他主张平等、尊重。他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儿童的行为和心理,学习他们的语言方式,了解他们眼里看到的世界,找到与他们对话的路径。在孩子的世界里,他感到自在而快乐。他认为童话是天然地存在于儿童心中的。“童话作者不写,童话却仍然要产生,而且天天产生,处处产生。”他把“四岁或五岁孩子对着玩具的自言自语”,“到了动物园里,又是那么一堆‘鸟言兽语’”等看作“未完成的童话”,或是“童话的萌芽”,“由于孩子们的需要,世界上已经产生了,正在产生着,而且还是继续产生许多这样的童话。”作家要做的,就是“抓住我们时代的特点,我们孩子的特点,新的生活带来新的主题,写出新的童话来”。由此,作为一个作家,他非常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重视语言的优美和意境的创造。他把童话看作“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诗体”。他要把人生哲理、高尚的品格等教育意义用儿童喜爱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还要注入美的素质,让阅读成为美的享受。

他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正是在这样一种创作理念下产生的优秀作品。这部发表于1957年的中篇童话,一问世即获得广泛赞誉,先后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影响呢?因为这部作品把教育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统一起来。作品构思新奇大胆,以有趣、易懂又印象深刻的方式帮助孩子们理解时间的宝贵。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读这篇童话时的感受。调皮的唐小西爱玩儿,没有时间观念几乎是孩子们共有的通病。小时候不觉得时间的宝贵,只觉得大人们总是在催促我们。这篇童话没有像平时大人们教育我们一样,说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而是顺应我们的心思,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不会被时间催着赶着的世界。但“下一次开船港”总是在等“下一次”,结果就是船不动,水不流,花不开,什么事也做不了。我们终于明白,没有了时间,也就没有了所有的事物。所以有些事情需要抓紧去做,不要总是拖拖拉拉地等着“下一次”。作家告诉我们只有当“下一次”变成了“这一次”时,“下一次开船港”才能变成有趣的“故事港”。一切从“这次”做起。这样一个寓教于乐的故事,孩子们怎么能不喜欢?孩子怎么可能产生抵触心理?严文井先生就是这样将他寄希望于孩子应具有的品质通过美好的艺术形式的表达而顺利地为孩子们所理解和接受。

严文井先生不仅创作童话,还写了许多创作心得与理论。他的《泛论童话》《童话漫谈》等文章对童话的本质和特征、童话的创作规律和发展规律,童话的美育和教育作用,以及童话的欣赏和批评等都做了系统的论述,至今读来,我们仍为其精到的见解而折服。像严文井先生这样,既有创作实践,又能从实践中找到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的作家是不多的,为我们的文学创作研究提供了范例。

严文井先生心中,为儿童写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他总是从时代的高度、大局的要求来构思,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大气而高远的气象。他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高尚的品格,作品中那些积极的、儿童式的幻想,不仅符合儿童的特点和情

趣,而且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富有深刻的思想含义。对待孩子,他主张平等、尊重。他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儿童的行为和心理,学习他们的语言方式,了解他们眼里看到的世界,找到与他们对话的路径。在孩子的世界里,他感到自在而快乐。他认为童话是天然地存在于儿童心中的。“童话作者不写,童话却仍然要产生,而且天天产生,处处产生。”他把“四岁或五岁孩子对着玩具的自言自语”,“到了动物园里,又是那么一堆‘鸟言兽语’”等看作“未完成的童话”,或是“童话的萌芽”,“由于孩子们的需要,世界上已经产生了,正在产生着,而且还是继续产生许多这样的童话。”作家要做的,就是“抓住我们时代的特点,我们孩子的特点,新的生活带来新的主题,写出新的童话来”。由此,作为一个作家,他非常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重视语言的优美和意境的创造。他把童话看作“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诗体”。他要把人生哲理、高尚的品格等教育意义用儿童喜爱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还要注入美的素质,让阅读成为美的享受。

严文井先生的作品不独童话,还囊括了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但在读者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还是寓言和童话。他的童话、寓言,多次获得全国大奖,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连环画,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读本,并译为英、德、俄、印度等多种文字出版,丰富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成就,他的童话和对童话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影响着新中国一代代读者的人格成长,严文井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培养“未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巨大作用。

同时,严文井作为文化战线上的杰出领导,更是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和楷模。严文井先生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国家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理事会理事,及中国笔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如此多的社会职务占去他很多的时间,但他始终不放弃创作,在自己创作的同时,还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组织、团结作家们多创作,创作好。他在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近20年中,努力贯彻党的文学出版方针,对出版社机构的设置、规划的制定,编辑队伍的建设,选题开拓、生产管理、团结著译者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70年代初期,他在任党委书记期间,就经常深入各部,听取群众意见,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逐步恢复出版社的业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更是团结社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积极支持人文社在京召开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促进了作家解放思想,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9年,为解决因“文革”造成的书荒,人文社集中推出49种中古古今名著,《鲁迅全集》(1981年版)就是他最早着手抓的一个重大项目,这些图书的出版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被誉为新时期文学出版事业的先声。之后,他又打破出版社只出书、不办刊的陈规,创办大型文学季刊《新文学史料》、文学理论丛刊《新文学论丛》、文学双月刊《当代》多种刊物和普及性读物《文学故事报》,并亲任《当代》主编,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不仅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且从历史上看,其保存现代文学的珍贵史料、与普及文学的知识和重的工作,也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严文井在团结作家创作,发现和鼓励青年作家创新方面,更是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他在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期间,专门成立编辑组处理自然来稿,从中发现和帮助新人,他不怀狭隘门户之见及偏见,同时对作品质量又坚持严格把关,决不降格以求,这就使得严文井先生那个时候的《人民文学》,既有中国新老作家各种题材、体裁的新作;又有研究中国诗经、晚周帛画、古典文学、梁祝故事等的专家论文;还向读者介绍每年推选的世界文化名人,如法国古典作家拉伯雷、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古巴诗人何塞·马蒂、俄国作家契诃夫等,刊登他们的照片及作品。就连供读者欣赏的单页插图也丰富多彩,既有当代中国画家的国画、油画,速写等新作,又有古代名画,还有外国绘画大师如伦勃朗等人的画作,这些承继传统,又致力创新的举措,使《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始终带有某种“示范性”,为培养中国文学生产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严文井先生是以身作则、坚持原则的好领导,也是大家的良师益友,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文学事业的忠诚。作为一位文学组织工作方面的领导,他的很多做人做事的理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最近,中央又出台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总书记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用栩栩如生的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严文井先生的一些作品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他把时代所要求的重要品质溶入到童话寓言中,作为新中国童话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他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儿童文学出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我国现有4亿多儿童,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儿童文学市场,从父母到孩子,从学校到家庭,对儿童文学阅读都有旺盛的需求,中国的儿童文学、中国文学都正处于一个迅猛发展的黄金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如何体现中国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美好心灵?中国文学面对市场的诱惑,如何坚持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力戒浮躁,精益求精?面对时代的巨大变革,中国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面对广大读者的热切期待和人们生活方式、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中国文学如何锐意创新,切实提高原创能力?文学评论如何坚持“说真话、讲道理”,更好地引导创作和阅读?这些都是摆在每一位文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课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切实做出回答。

严文井先生离开我们10年了,但他的作品替他做出了回答。我们纪念这位大师级的文学家,讲述他生前的故事,总结和研讨他的创作,其目的,也正是想从老一辈文学家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做好时代和人民要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做的答卷。我想,做好这个答卷,让读者满意,让人民满意,这才是今天我们对严文井先生最好的纪念。

## 走在童话的路上

——忆严文井

□高洪波

有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作品,给了严文井以最初的精神营养。紧接着就是了不起的安徒生。安徒生的书里虽然写到许多奇特的事物,但他引导人去经历的却不只是奇异的世界。从他的如画的散文里,严文井感到一种诗意的享受,并意识到了童话和文学的巨大力量。他开始有了一种朦胧的创作愿望,要用笔来补足自己从前没有得到的东西。

当他尝试着用笔写点什么,还与童话无一点干系。这时的严文井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他以细腻的艺术感受,写成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这正值“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接着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和一批报告文学相继问世。他追随着时代的脚步,要用文学来参加战斗。他在延安“鲁艺”任教期间,抱着对旧时代的诅咒和对新生活的热望,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文学形式——童话。他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集为《南南同胡子伯伯》,1943年在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从此,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出现在文坛,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大读者和小读者的喜爱,而他的童心,也借助于童话这种最合适的形式,得到痛快淋漓的表现。

童心固然可贵,但作家为完成和表现童心所做的努力,所形成的艺术境界更使人感到珍贵。在访问时,严文井多次强调过:“童话虽然很多是用散文写的,而我却把它算做一种诗体,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散文。安徒生童话之所以使我震动,不是故事的情节,而是内在的诗意。”在严文井的创作中,这种诗的追求是异常明显的。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小溪流的歌》就是一首

无韵的诗。那起伏的山峦、蜿蜒的溪流、江河、大海、阳光,构成一幅气势恢弘的图画。而《南风的话》《歌孩》《浮云》及《春夏秋冬》等篇,熔自然风物和深刻的哲理于一炉,使执著的现实感与宏大的理想和谐地结合起来,“未来的世纪需要我,我要促进诞生、成熟和收获”《南风的话》。当然,把童心转化为诗心,是一种艺术风格的追求。对于小读者来说,似乎还不能使他们完全满足。要补充的是文井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儿童情趣。这就要涉及作者的匠心。谈到这一点时,严文井深沉地说:“有人觉得儿童可爱,当做玩具。我从来是认真的,把儿童当做我谈话的对象。我们要把孩子当做能思考的小人,平等地对待他们。对他们讲话要开诚布公,不说套话。以这样一种态度写书,就不会把孩子当成什么也不懂的可以瞎糊弄一番的娃娃,就能写出既有趣,又有深刻思想的书来。”他主张儿童文学作家要学会用儿童的眼睛观察生活,力争多懂得一点孩子。

在严文井的童话创作里,这种充满儿童情趣的场景、生动的细节俯拾即是。在即将发表在《朝花》第6期的一篇新作《歪脑袋木头桩》里通过一个小孩雕刻的木头桩的头像的故事,表现了老人的一种固执而又可爱的性格。从老木桩上的头像被一群工人刨掉改成长椅子后的寂寞,到一群小姑娘拴起皮筋跳活了他的心,震响了埋在心底的久远的回忆,自始至终情趣盎然,匠心独运。20世纪50年代他那篇代表作《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把时间是物质在空间的运动形式这一很抽象的概念,生动形象地借助于唐小西的遭遇表现

出来,曾经获得了许多国家的不同民族的小读者的欢迎。他们从世界各地给作者寄来信件,感谢他为自己在生活中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伙伴。

严文井在自己的作品里,努力输入着这种信念:鼓舞孩子奋发向上,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儿童的自尊与自信,从而成为心灵美的追求者。但是这种输入不是政治概念赤裸裸的陈列,而是艺术的生动表现。如在《不泄气的猫姑娘》里,就在不动声色的艺术描写中,写出了作者对孩子的热爱,赞扬了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小猫姑娘可爱而又淘气的行为,为一系列的失败和挫折,使小读者充满惊喜和同情,但“春天过去,夏天将会帮助一切小动物变得成熟起来”。失败而不沮丧,永远乐观地奔向生活目标,这就是老作家给予小朋友们的启示。

谈到启示,严文井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启示》。在这篇文章尚未发表时,我有幸在他的书房聆听了他的朗诵,当文井同志慢慢地读到“母亲在你背后,道路在你面前,母亲为你举灯照明,只要你永远记得那道光,道路就永远不会从你脚下消失”时,他停下了,深沉地说:“这虽然是写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但这母亲和灯光的感受是我自己的。我忘不了自己在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的前夜,母亲最后一次来看望我的情景。老人一定要在我出门时为我打亮手电筒,照一道亮光。这是我母亲给我的最后一次祝福。不过,我们可以把母亲的意义推得更广,祖国也是我们的母亲。”他还风趣地告诉我,他将来写的最后一篇作品,可能就取名为《母亲》,以此表达对他祖国、对哺育过他的前辈的感谢。

那一年,我听了严文井同志风趣的自白后,我当时在想,他的“最后的作品”,也许只是遥远的未来。而对祖国——母亲的眷眷情感,他早在50年前就逐渐开始偿还了,这童心、诗心、匠心与雄心所凝铸的作品,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

我正在国外探亲,得悉严文井百年诞辰纪念会即将在京举行,情不自禁地想写点什么,以表达我对这位充满睿智、幽默的老领导的怀念、感激之情。

文井同志是久负盛名的儿童文学家、散文家,也是一位享誉文坛的编辑出版家、文学组织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有幸结识这位文学前辈,他是我跨进作协门槛的第一个上级。1952年文艺整风后,中宣部为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指派文井同志到文协代理秘书长。他和邵荃麟、冯雪峰、沙汀等同志一起,最早投入改组全国文协、筹建中国作协的工作。他称得上是作协一个元老级的人物。

我是1952年初冬时节跟随文井同志同时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大门的。在文井麾下,参与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组织在京部分作家、批评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等活动,经历了筹备二次文代会、改组文协为作协的全过程。文井的言传身教,让我学习了文学组织工作的ABC,也培养起我心甘情愿跑龙套、乐于为作家服务、为繁荣文学服务的精神。我能坚守文学组织工作岗位几十个春秋,不能不由衷感激启蒙老师严文井当年给我上的入门课。

在我的文学之旅中,文井同志也是引领我向儿童文学靠拢、停泊的引路人。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的《南南和胡子伯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等,都是我爱不释手的读物,激起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和热情。他那“要拥有孩子一样的眼睛、心灵和幻想”、“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和美”、“童话是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等观点、主张,也成了我后来从事儿童文学评论始终用心思考、力求把握的准则。在儿童文学组织工作上,改革开放后,文井同志一直担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作为他的副手,具体操办日常工作。在他年届耄耋、精力日衰之后,他满怀信心地鼓励我:大胆放手地干,用不着事事征求我的意见。这时,我才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在发展、繁荣儿童文学的跑道上继续向前迅跑。

在做人处世上,文井对我的点拨、启迪也是难以忘怀的。当我在反胡风、反右派中碰了壁、遇到麻烦的时候,他情真意切地开导我:“摔倒了,要坚强地爬起来,继续勇敢地往前走”,“要听得进逆耳之言,上级对自己老是笑着,不一定好;对自己疾言厉色,不一定坏。”在195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不要有任何个人得失的考虑,什么‘当过作协书记处书记呀’、‘不到退休年龄就不被信用呀’等等,都置之度外,尽可能保持心态平衡,集中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一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上,让我感到十分温暖。

岁月匆匆,文井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庞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那直率幽默的谈吐也不时萦绕在耳边。文井在《我仍在路上》中说:

“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这何尝不是每个正直的中国人的心